

文史資料特輯

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

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二十周年

1866——1986

· 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編印

说 明

一、今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我们收辑了一些有关孙先生的事迹和论述，以及在我室各期《文史资料选辑》刊印过的一部分比较有参考价值的辛亥革命史料合编成特辑，以表对孙先生的崇敬和纪念。

二、本室编印《文史资料》，是贯彻全国政协章程中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规定，保存积累历史资料，供历史研究者的参考。由于撰写人年事较高，经历见闻时隔久远，所写资料，难免有遗误与错漏的地方，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三、凡本室编印的《选辑》或《特辑》、《专辑》，均是内部资料，赠送有关单位作研究参考，不对外发售，各地单位和文史刊物如欲采用或转载，请来函联系。

四、各有关单位如有编印文史资料一类书刊，希惠予交换，俾资借镜，以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

五、过去我们征集的稿件，系在国内范围，时间由戊戌维新运动至解放前。从现在起，将时间下限延长至“文化大革命”前。从现在起，同时征集“革命回忆录”和关于香港、澳门、台湾的各种史料。

六、本《特辑》亦作为我室《文史资料选辑》的三十辑。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

地址：广州市解放北路542号

文史资料特辑目录

- 孙中山先生伟大言行片断……………李洁之(1)
- 孙中山先生在港、澳和海外的革命活动记略
……………彭秋平(8)
- 孙中山先生革命言行的几点忆述……………黄梦熊(16)
- 孙中山先生第二次北伐的片断回忆……………吴宗泰(24)
- 记孙中山先生在庆云寺所书对联……………黄若天(26)
- 回忆孙中山先生的演说及黄埔军校开学日期
的意义……………冯也愚(27)
- 辛亥革命的回忆……………姚雨平遗稿(31)
- 晚清广东新军……………莫雄(40)
- 史坚如烈士死难记……………冯执经(53)
- 关于杨鹤龄的一些事迹……………張大华(60)
- 辛亥革命前后广东政治见闻录……………王鸿鉴、黄韶声(65)
-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前后二、三事……………陆精治(98)
- 民初广东民军鳞爪……………徐本明(101)
- 民初广东省议会概况……………王鸿鉴(105)

论述

- 忆当年,想今朝,国共合作好!……………李星川(113)
- 简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何孟淳(116)

孙中山先生伟大言行片断

李 洁 之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二百六十多年来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从而发展了我国民主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其意义的重大与影响的深远，是众所周知的。

公元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和大元帅时期，我曾当大本营警卫团的排长。粤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的连长，担任过孙先生的拱卫工作。孙先生的伟大事迹，已是天下皆知。现就个人所见所闻，又是比较少人纪述的几件事，向大家报告如下：

一、孙先生生活平民化、态度和藹、平易近人

孙先生任非常大总统和大元帅时期，我曾断断续续地担任过拱卫工作。看见孙先生对于那些晋谒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固然逐一延见。而对于来访的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等更是热情接洽，从不推拒。他有时要乘火车、轮船往外地去视察或往前方指挥作战，从不派军警沿途站岗警戒。在车站、码头也不让排列军乐队仪仗队和大批文武官员去欢送欢迎。从不搞虚荣、闹排场。至于他在广州市、桂林市内、有时到机关、团体、学校去开会演

讲，也是轻车减从。与群众见面时，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大家都感到这位旋乾转坤领导革命的伟大领袖是自己的亲人。

二、孙先生指挥作战的艰苦时刻仍不断进行读书学习

公元一九二三年八月中旬，退据惠州地区的陈炯明叛军叶举所部一万多人，在突破包围惠州城的讨贼军刘震宁所部后，即向东莞、博罗、龙门增城反攻，企图进扰革命策源地广州。孙中山先生对此：一面亲自乘坐大南洋电船由广州出发到石龙，指挥各讨贼部队进行阻击；一面急调驻梧州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前往增城、博罗增援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那时我任粤军一师二旅三团的连长。奉团长邓演达之命，率部一百多人，分乘民船三只用小火轮拖往石龙，拱卫大元帅的座船。当时大南洋电船和一只紫洞艇停泊在西铁桥之北约三百多米的大树下。我连的船只到达后，被指定停泊在紫洞艇后约四十米，随即派出三个军士哨在河岸警卫。当时的天气乍晴乍雨，但各官兵仍日夜轮流警戒，大家都不以为苦，而感到这是极其光荣的任务。经过十天，改由刘连接班，我们则调往博罗归队。这段时期适值大雨，东江河水高涨，阻止了陈家叛军的西窜，稳定了我军阵势，随即将之驱回老巢。

据孙先生的侍从人员姚观顺、马湘说，孙先生当时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约在上午六时半起床，清洁后即登船上甲板散步。至七时半早餐，随后独坐客厅读书约一小时。接着便由侍从人员汇报情况，指示工作，接见宾客，批阅文电。午餐后休息。下午二时半以后，又接见宾客或举行会议。晚餐后阅读报纸，听取侍从人员的报告，批阅文电完毕后即就寝。这些情况有时我亦能亲眼看到。在指挥作战的艰苦时刻，他老人家仍然从容安静地用一定的时间读书阅报。足见其好学深思，使我认识到孙先生之所以学识渊博、思想时新的原因。从而鼓励了我加强学习求知的意

念。

三、孙先生谆谆教育军人要救国救民

公元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选举的大总统，并接受北伐全权。随即发兵收复广西，亲往桂林设立大本营，策划假道湖南出师北伐，以统一中国。同年十二月十日（？）他将集中在桂林附近待命入湘的北伐军——滇军、赣军、黔军、粤军等将校召集到大本营内，向他们演讲《军人精神教育》，以改变他们的气质和提高他们的觉悟。这次演讲记录很快就印成小册子，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浅说》分发各部队军官学习。那时我在警卫团当排长，也领到这些小册子，进行学习。我体会到它的主旨：在阐明革命军人救民救国的职责，质言之即为扫荡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再造一个统一富强之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应该是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作为前锋的军人养成具有坚定革命之意志，才能忠于职责，完成任务。孙先生所称的革命军人，与一般军人有很大的区别。它必须具备智、仁、勇三大要素。革命军人具备了三种要素，还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辞劳苦、不惜牺牲、前仆后继，去完成革命任务。诚如是必能达到国强民富，而个人才能建立伟大功勋，永垂青史。孙先生这篇演讲给我非常大的教育和启发，使我认清了革命道路，坚定要做一个为民前锋的革命军人。

四、孙先生的知人之明和大公无私

胡毅生、罗翼群生前都曾先后对我说过：民国十三年（即公历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程进至酝酿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候选人时，李烈钧根据大家交谈的意见，开列一张名单交给孙先生。先生接看后，对

其他人士都没有什么意见。惟将名列最后的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蒋中正用红笔圈掉，并在其旁批示：“介石长于军事，应致力于军事工作，不宜办理党务。如果以喜欢独断专行的军人来办理党务，那是十分危险的。切记切记！”由此可见孙先生因材用人和知人之明。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前后一年，我当过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委员会委员，由此获知和看过这张名单和经过孙先生修正的《民族主义》演讲记录稿，不知怎么都转到邓青阳手上保存下来。复员后，邓青阳将它交给设在南海学宫的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委员会。该会即将它和孙先生的好些遗著，很郑重地在会里用大玻璃框陈列起来供人参观浏览。据说后来不知怎样给一向自吹自擂为“中正受总理付托之重”的蒋介石知道了，认为这对他的历史声望有很大的不利，于一九四九年夏，派邓介民乘专机飞来广州，将它取去立即携回台湾交蒋介石销毁了。

胡、罗还说：当时张继以孙先生不同意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便乘机向先生推荐孙科顶补。孙先生听了随以极严肃的态度对张说：你是不是以为阿科是我的儿子呀！？他现在的学识资历尚浅，不宜担任这个重任。清代我转告阿科要努力学习锻炼，以求长进。你们对于中央委员人选，也要慎重考虑，千万不要随便拉人凑数。

我以为远的可不去说，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三十多年，不论是什么社会制度，国家的执政人和继承人都出现了一些“家天下”的事实。所谓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固然不乏其例，即自命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也有不少搞终身职、子继父业的。而孙中山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处在封建思想仍极浓厚的中国，却能毫无自私自利之念，绝不以父子之亲，徇张继之请，他大公无私的精神，确是永垂不朽！

五、孙先生勉励国人要以俄为师

公元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七周年。大元帅府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及留驻广州的建国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和第一师第三团徐景唐部（当时担任拱卫大元帅府任务）全体官兵在沙河镇燕塘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当时我在第三团任连长职务，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大会。

孙中山先生于上午八时半，乘汽车莅临会场。检阅部队后登上大会台，令部队各级军官排列在台前，随即举行纪念仪式，然后向与会人员讲话，大致说：今天是俄国十月革命七周年。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一方面庆祝他们的伟大胜利是为全人类带来走向光明的福音；一方面是策励大家要为国民革命事业奋斗，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和富强康乐。孙先生接着说，俄国革命在中国革命后七年，他们现在已经建成为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国家。反顾我国，虽然在辛亥年推翻了清廷专制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当时过信白纸黑字的约法和国会的权力，以为一定能够监督政府，轻率地把新建立的革命政权交给了反革命头子袁世凯，以致酿成大军阀大官僚把持其上，小军阀小官僚割据其下，弄到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并深受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今天要瓜分，明天说要共管，造成国家不象样子，言之痛心！而俄国为什么能成功呢？是因为共产党人能团结一致，服从列宁导师的领导，为主义而奋斗，而牺牲，绝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反过来看看我们的国民党员，特别是申上级的军政人员多数不懂革命道理，不明三民主义为何物，实际同北洋军阀官僚差不多，只知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罔顾民生国计。当他们穷无所归时，则来依附本总理，佯言矢志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效力。迨至羽毛稍为丰满些，就违法乱纪，横行霸道，甚至公开背

叛革命，不惜与本总理为敌。现在到会的总司令、军长之中，也有些人不知自爱，不教育训练部属，不学习政治，不提高作战技能，甚至不服从命令，竟然各霸地盘、截留税收，包烟庇赌、鱼肉人民。一旦要你们去打仗，你们就向大元帅府要粮饷要弹药，稍不如意，则违抗命令，按兵不动。这种形同土匪的行为，在革命队伍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去恶从善，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努力扫荡反动势力，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立万世不朽的功勋。最后讲到革命，他扼要地说，今后我们必须“以俄为师”，对组织，纪律、教育、宣传等固当特加注意，即在军事设施方面也要以红军为楷模。如能切实遵循本总理手订的《建国大纲》和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也一定会成功。对于孙先生的讲话，全体听众无不动容，六十二年前孙先生的语言至今犹回环在我两耳，铮铮有声！

六、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扶病入京以谋国家之统一与建设

一九二四年秋，直奉两系军阀在华北发生大战，正在冀东打得火热的时候，受到国民党策动的直系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至十月十五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吴佩孚的贿选政府，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将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随与张作霖段祺瑞等联名电请孙中山先生到北京，商议国家大事，孙先生以南方革命已有基础，亟待北方发展，乃于十一月十三日毅然扶病北上。他老人家偕夫人宋庆龄等离开大元帅府，乘兵舰启程时，我们粤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大部分军官都在河南码头列队欢送。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他发表的《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国家之统一与建设；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国家之独立与自由，并强调今后国民革命应划一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化为国民之武力，永绝军阀与帝国主

义之祸根。我们第三团随即发动各级官佐对此重要《宣言》结合《建国大纲》进行学习。在此鞭策下，使我对革命的认识与政治觉悟，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最后，我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在于“天下为公”仁民爱物，不断进步。他的嘉言懿行不胜枚举，均足为后世楷模。今天更足为爱国人士作为座右铭的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海外人士，共同勉励！为实现当前三大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在港、澳和海外的 革命活动记略

彭秋平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战争惨败，屈辱割地赔款求和，全国震动，人心义愤！此时，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只有“革命”才是中国唯一出路。遂于当年秋出国，奔波于世界各国的华侨间，寻求对革命的支持。在东方他以日本为中心，往返于东南亚各地；在西方他经檀香山奔走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欧州大陆。在华侨与留学生之间，进行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筹集武装起义经费，对革命贡献很大。“华侨是革命之母”，诚非虚言。孙中山的海外活动，是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重要部分，无可忽视。

我十五岁那年，孙先生夫妇来访我广州西关陈家祠故居，写下“救国”二字相勉。我下述的回忆，都是从孙先生、孙夫人，及乡亲司徒美堂，邓三伯（荫南）的谈话中综合整理出来的。事隔四、五十年，仅凭记忆所及，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仍请读者补遗订正，是所厚望！

一、在美国与洪门致公堂的关系

一八九四年秋，孙先生首次赴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革命力量。当时檀岛华侨风气闭塞，多数安于现状，怕因反清遭灭族之祸，听到孙先生的言论，或不理睬，或掩

耳惊走，或讥之为“孙大炮”。因此，一时工作难于开展，只有他的长兄孙眉同情他，表示赞成，那时孙眉是“茂宜岛”的大畜牧实业家，有“茂宜王”之称。自愿拨出一部分财产，给他作革命活动经费，并发函各友好，寻求支持。

同年十月，孙先生组织同志二十余人，借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住宅，举行第一次会议，成立“兴中会”，起草了章程，并提出“驱除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口号。这是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新信号，意义深远。新成立的“兴中会”同志们，曾发起筹捐募款活动，以备武装起义之需。然而活动了一个多月，筹款不足千元，中山先生为此焦灼不安，胞兄孙眉知晓后，乃将牧场上一部分牛羊，低价卖出，全数捐给起义军。“兴中会”的邓三伯（萌南），也将其经管的农场和商店，全部变卖，将所得六千美元，全数交给孙中山作革命经费，并表示亲身投入革命行列。又介绍廿多位爱国华侨参加“兴中会”，邓被推为“兴中会”副主席。孙中山在檀岛聘请一丹麦教官，开设华侨军训班，受训者三、四十人。

一八九六年六月，孙先生首次赴美国纽约市访问，传播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筹募经费。纽约唐人街的“赖神书馆”是孙先生当年的住所。（现已改为“宝宝餐馆”的地下室）室内狭窄，人多床位少，孙先生每晚席地而睡，清晨起来，常到宰也街黄二嫂的面馆吃一碗汤面，因为去熟了，黄二嫂对孙先生的革命行动，十分同情。虽在清政府密令通缉孙先生的情况下，有胆有识的黄二嫂仍然热诚招待孙先生，不仅每天免费供他面食，而且劝他多吃。那时侨胞周某在这里摆有一个小摊子，中山先生就利用这个小摊子向侨胞宣传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道理。以后复漫游各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孙先生第二次重访纽约。初时仍住在“赖神书馆”，后迁东边九街长老会。在此期间，他以孙逸仙的

名字发表宣言，阐明中国革命的道理，在于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以与世界各国共享和平，争取华侨与美国友好人士的同情与援助。那时，洪门致公堂，在檀香山及美洲大陆华侨社会中，均有很大势力，孙先生的舅父杨文纳和长兄孙眉，都劝孙先生加入洪门。是年十一月，在他重访美国前夕，由洪门叔父钟兆养介绍他参加洪门致公堂，洪门兄弟亲切地称他为“革命大哥”。孙先生此次赴美，由于清廷驻檀香岛和旧金山的领事同美国移民局相勾结，在孙先生抵达旧金山时就将之扣留。后经洪门人士多方营救，才被释放。并召开欢迎大会。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孙先生第三次赴美国，抵纽约后，由他亲自主持成立“纽约同盟会”。首次加入同盟会的二、三十人中，有上述的那位面馆女主人黄二嫂。随后，孙先生还到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组织同盟会，并在旧金山建立“美洲同盟总会”，负责筹款，训练华侨子弟兵。在辛亥革命时组织了华侨炸弹队，敢死队回国参与革命。

孙先生在波士顿时，曾住在爱国侨领和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家中五个月。司徒先生对革命竭尽全力帮助，先后变卖致公堂产业得款卅多万美元支援。

一九一一年，孙先生第四次访美国时，进一步号召华侨联合起来推翻清皇朝统治。正当孙先生在北美各地奔走宣传筹款时，爆发了三月廿九日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者的壮烈牺牲，震惊了全世界，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和援助更加积极了。孙先生到美国各地演讲筹款也更顺利了。到一九一一年底，共筹得款项廿四万五千美元。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先生立即取道欧洲，于十二月廿五日返回中国。

二、三次赴加拿大宣传革命

孙中山第一次赴加活动，乃在一八九七年七月，他于上年伦敦蒙难脱险后，尚留居英国半年，然后乘轮由欧来加，考察加拿大政治及侨情，先抵蒙特利尔，稍事停留即乘火车西行至温哥华，旋抵域多利，此皆当时加国侨胞聚居地区。是次孙先生停留二十天左右。除结识“美以美”教会牧师陈阶外，并结交英昌隆店主李其烂、李进父子，商议宣传革命工作，此乃孙先生在加革命活动之始。惟当时侨社尚为康有为的保皇党势力操纵，故成效不大。

一九一〇年二月，孙先生第二次赴加访问，在温哥华，域多利及附近小埠逗留月余。其时正值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为了再图举事，多方筹集款项。由于华侨同情革命，踊跃捐输，为革命打下胜利基础。时在香港任同盟会长兼《中国日报》社长冯自由策应孙先生在加的革命宣传与筹款活动，乃在域多利主办“大汉报”，除与保皇党的“日新报”展开笔战外，并秘密广招同志，扩大力量。时冯亦系洪门会员，域多利致公堂视手足。其时孙先生在南洋筹划广州举事，需款甚急，冯乃电孙先生兼程赴加，力辟筹款新途径。

一九一一年辛亥正月初八日，孙先生第三次赴加活动，抵温哥华车站，其时温哥华的华侨仅五千人，而欢迎者竟达千余人，盛况空前。随由冯自由及致公堂父老迎接前往堂所。在欢迎会上，孙先生向侨胞阐明革命意义及筹饷目的。致公堂并安排孙先生在广东道华人大戏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连续四日，每日听众逾千人，争取得大量原为保皇党或中立派之华侨的拥护。

孙先生在温哥华逗留期间，由洪门致公堂林立晃、马延远保护及招待。当时洪门致公堂的领袖是司徒美堂，他与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有亲密友谊，老罗斯福曾任旅美华侨团体安良堂律师顾问

达十年之久。对司徒美堂爱国行动很有方便。孙中山初到美国宣传革命时，住在司徒美堂家中动辄几个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需款甚急，司徒即先汇廿万元美元，继后还将加拿大、温哥华等地的三所致公堂大楼典押，筹足廿多万美元交中山先生汇回国内。辛亥革命成功，孙先生尚滞留美国，司徒美堂又给他筹足五百美元作路费，让孙先生早日起程回国领导革命。

三、在日本与宫崎寅藏的友谊

辛亥革命前，日本友人积极帮助孙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除了梅屋庄吉外，最著名的就是宫崎寅藏。日中友协的创始人宫崎世民（最近在日去世）就是他的侄儿。宫崎寅藏，号白浪滔天，原名虎藏。生于一八七一年。廿五岁时，就主动加入孙先生的“兴中会”，热情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一八九七年，孙先生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历时三年之久。是年九月，宫崎寅藏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彼此神交已久，一见如故，情同手足，畅谈革命，他俩思想非常接近。宫崎衷心钦敬孙先生，常对人说：

“孙逸仙是一代大人物”，“其人诚东亚之珍宝”，“其言诚革命之准则”。佩颂备至。从此，他更加坚定地追随孙中山左右，全力赞助中国民主革命，并为以后日中友谊奠下基础。在此时期，经宫崎之介绍，孙先生认识了日本民党领袖初执日本政权的犬养毅，大隈重信等政界人士，随后又结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萱野长知，平岗浩太郎、山田良正、内田等朝野人士三十多人，其中都是真诚地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孙先生也一直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忠实朋友。

一八九九年，孙先生派人偕同日本义士平山周赴湘、鄂各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反清建议。同时，陈少白、郑士良等在香港设立联络会党的机构、与广东的“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是年十一月陈少白、郑士良和宫崎滔

天、平山周等日义本土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公推孙中山为领袖。

与此同时，宫崎滔天想方设法宣传孙中山的学说，鼓吹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意义。一九〇六年他和其他日本友人一起捐资创办“革命评论”刊物，宣传上述主张，给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以有力配合。他还把孙先生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在《九州日报》上连载。撰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支那革命运动》等著作，颂扬孙先生的革命主张与伟大人格，阐述中国民主革命的意义。

孙先生亡命日本时，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捕，曾多次居住宫崎家中，宫崎的家人敬爱孙先生如同自己的长辈。最后一次，孙先生在宫崎家里住了十多天。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电促孙先生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宫崎为了保护孙先生，随同前来中国，并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典礼。

宫崎滔天家中，至今还珍藏着三个皮箱的辛亥革命史料，其中有中山先生和宫崎的笔谈录，孙先生和黄兴给宫崎及其儿子宫崎龙介的信，以及中山先生字画手迹和照片等。一九三〇年我在日本留学时，孙夫人宋庆龄曾同我去见过宫崎龙介、参看过部分史料，至今还记得的孙先生一首“革命歌”，歌曰：

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摧；
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宫崎滔天这间座落在日本九州熊本县荒尾市的故居，已被熊本县列为受保护的重点文物“史迹”。故居的大门矗立着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建立的花岗岩石柱，刻着廖承志同志的题词：“孙文先生东游之地”。

四、在香港、澳门与梅屋庄吉的关系

一八九二年間，孫中山在澳門受鏡湖醫院聘請為西醫師。不久又在澳門草堆街自己開業，單獨行醫，兼設中西藥房。因醫術精明，求醫者日眾，醫務蓬勃發展，招來行家嫉妒和排擠，孫先生雖持有英國發的行醫准許證，但無葡萄牙的簽證，乃不得已停業關門，離開澳門。

一八九五年一月，孫先生自檀香山抵香港。經他的老師英國醫學博士康德黎之介紹，認識日本義士梅屋庄吉，當時梅屋在香港中環開設照相館，二人一見如故，梅屋深受孫中山革命言論的感染，決意全力幫助孫先生進行革命。從此，兩人頻繁來往於廣州香港間。梅屋以日本貿易商人的身份作掩護，出資購運械彈武器，接應武裝起義之用。

一九〇五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到東京籌建同盟會。此時梅屋庄吉已將香港的照相館結束回到日本，經營電影事業。入息比前更多，他就更多捐款支援孫先生的革命。在他的無私援助下，增加了《民報》刊行的數量。十月武昌起義成功消息傳到日本，梅屋即提供經費十多萬元，隨後又繼續匯款廿多萬元給孫先生。

到了袁世凱篡權稱帝，孫先生又逃亡日本。時袁世凱與日本政府相勾結，不准孫先生登岸，並暗中派人跟蹤追捕或進行行刺活動。梅屋此時挺身而出，與犬養毅，頭山滿等日本友人進行援救工作。經過周密行動，才使孫先生安全脫險，到了東京，先在頭山滿家隱藏，然後轉移梅屋家中，梅屋持槍保護。一切生活費用，都由梅屋包下來（包括隨從人員四五人在內），甚至換洗衣服瑣事，也由梅屋夫人擔當起來。

一九二八年我在日本留學時，孫夫人宋慶齡曾帶我到梅屋庄吉的寓所。一九一五年，孫先生與孫夫人就在梅屋家中舉行結婚典禮的。我們喜見了梅屋庄吉先生，那時他六十二歲，正準備